

教育家康有为功过简论

王建军

(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康有为在近代教育改革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站在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之上顺应潮流拉车前进所表现出来的伟力,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从教育家角度对康有为历史地位进行分析,是我们对其历史功过进行定位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康有为;教育家;功过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4)01-0044-06

1927年,康有为跨入了人生的第70个年头。虽然他企盼清室复辟,力倡孔教为国教的热望并不见有丝毫的减退,但他心里明白,复辟之梦是难以再圆了,环顾四周,昔日的门徒同党也大多对他敬而远之,愿意奉承其衣钵者寥寥。

康有为始终不能明白的是,是他自己用自己的手筑起了一道墙,把自己与时代隔绝开来。而当他真正意识到自己形单影只之后,他更是决意用自己的顽固来与整个社会潮流相抗衡。1927年2月14日,清废帝溥仪22周岁的生日。康有为不顾年迈体弱,亲赴天津,以弼德院副院长的身份向溥仪祝寿。溥仪见他年事已高,免其三跪礼,使他感激涕零。1927年3月7日,也就是康有为70岁生日的前一天,溥仪派人送来了亲笔书写的“岳峙渊清”匾额一副,玉如意一柄,以祝贺康有为寿辰。这使康有为受宠若惊,他立即写下了《追述戊戌变法经过并向溥仪谢恩折》。他在文章中历数变法、蒙难、保皇、倒袁、复辟的经过,深深表达了“回天无术,行泽悲吟”的愧疚。为感谢溥仪的寿礼,康有为出自肺腑地说:“此岂微臣所当被蒙,尤为老臣惊于受宠。付子孙传后世,永戴高天厚地之恩;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1](P1125)]康有为命人将文章用小楷清缮,石印1000份,以备第二天分赠祝寿客。诸事办毕,康有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吾一生心事已了。”

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于历尽磨难,一生坎坷而又久不得志的康有为来说,这一日子自然是非同寻常。他仰俯人天,感慨万千,一大早便赋诗一首以抒胸臆,其中有四句:

天乎百亿千万劫,丘也东西南北人。

中国存亡自关命,高歌醉酒笔如神。^[2](P411)]

这位七十古稀的老人,在这一天想起了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是终生不得志,然而其死后却是身价倍增,荣华富贵令后人羡慕不已。七十岁的康有为已没有别的奢望,只希望自己身后也能如孔子那样,享有数不尽的殊荣。因而,这首诗既是自诩也是自勉,其间既有得意也有愤世,表达了七十高龄的康有为坚意要以卓然超俗天马行空的态度与时代与社会抗争的志向。

在《记事述怀诗七章》中概述了其七十春秋的险艰情伪,哀伤清王朝的覆灭与复辟的失败。面对溥仪的被逐出宫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他在最后一章中只能发出生不逢时的哀鸣:

满地干戈惨惨民,乾坤毁矣痛蒙尘。

天乎人间是何世,命也我生逢不辰。

当然,弟子们的敬师之情使康有为多少还是有所慰藉的。尤其是因张勋复辟事件而与康有为公然决裂的梁启超,特地从北京赶来贺寿,并亲撰寿文一篇,寿联一副,并恭笔正楷书写于寿屏之上。这使康有为倍感欣慰。其寿联为: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
年七十矣。

收稿日期:2013-07-20

作者简介:王建军(1951—),男,湖南南县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奉觴豆于国叟,致欢忻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

梁启超在寿文中写道:

启超等或于役京国,或息影家园,或栖迟海外,不能一一抠衣趋祝。惟往往风晨雨夕相促膝,话畴昔少年同学事,则心魂温而神志飞扬,谓为有生第一至乐。而知先生亦必有以乐乎此也,乃以所以乐先生者为先生寿。

字里行间,充溢着温馨的师生之情和对老师的爱戴之心。这一情怀对于久历政海的康有为来说或许已是久违了,但学生们是不会忘记的。学生们不会忘怀老师的诲育之恩,不会忘怀老师开创万木草堂的历史功绩,也不会忘怀老师在戊戌变法中为民族为国家所作的贡献。当然,他们也希望老师能达观豁达,安度晚年,梁启超真诚地说:“戊戌以后之新中国,惟先生实手辟之。今之少年,或能讥弹先生,然而导河积石,孰非闻先生之风而兴者,事苟有济,成之何必在我,先生其亦或可稍抒悲悯,壅容扶杖,以待一阳之至也。”^{[3](P1124)}七十寿辰能收到这样一份贺礼,康有为应该是知足了吧?

人生多有巧合,历尽苍桑的康有为在临近人生终点之时竟收到意义如此迥异的两件礼物:一件是从政治角度,封建遗老遗少以“岳峙渊清”来赞誉康有为对大清朝廷的忠诚;一件是从教育角度,门人弟子们以“话畴昔少年同学事,则心魂温而神志飞扬”来感谢老师的诲育之恩。政治家兮?教育家兮?抑或康有为的人生里程就应该由这两种评价来划上句号?

生日过后,康有为离开了上海去青岛,但他的心情并不能因此好转。每到夜间他总要独自仰观天象,最后的结论总是“完了,完了”的重述。一日参加广东同乡的宴请,因吃了不洁之食物,导致腹痛呕吐。经医治后,病情稍有好转,子夜时分,他又照例观看天象,照例又说“完了,完了”,然后说:“中国我无立足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这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至清晨5时30分,康有为溘然长逝于青岛福山路6号“天游堂”居室。

康有为带着巨大的遗憾走了。当年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时代骄子,最后竟以落伍者的落魄结局结束了他的生命进程。这种判若天渊的人生历程自然也就成为历史研究的谜。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以他大起大落的作为使其生前死后招致来诸多的盛誉和责难,诸如维新领袖、保皇党魁、教育泰斗、复辟的祖师爷……,这些

截然相反各趋极端的评价竟集于康有一身,这在近代人物中也是少见的。还是他的弟子们聪明,面对世人对康有为莫衷一是的议论,他们在充分宣扬康有为在维新运动的历史功绩之外,则异口同声地礼赞康有为作为大教育家的资格。梁启超说:

先生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虽然,其为大教育家,则昭昭明甚也。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备教育家之资格,其品行方峻,其威仪严整。其授业也,循循善诱,至诚恳恳,殆孔子所谓诲人不倦者焉。其讲演也,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又常反复说明,使听者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心悦而诚服。^{[4](P8-9)}

张伯桢说:

世之论先生者,不失之溢美,即失之讥弹,然舍政治弗论,专就草堂教育言之,则先生亦自有其不朽者在。^{[5](P101)}

陆乃翔等人也在传记中强调:

先生之为何人物不可定,若其教育之成效已昭昭矣。盖先生以其极博之学,至深之思,而又有中正之行,威严之仪,宽裕之德,肫肫之仁,不倦之诲,大雄之辩,于大教育家之资格,无不具备。又穷而在下,日以成就人才为己任,故诱掖奖劝,妙为风化。^{[4](P68)}

梁启勋的话说得更绝:

假令康先生终身讲学,不作政治活动,其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更大。用其所短,惜哉。^{[4](P241)}

弟子们对恩师的偏爱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康有为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进程中的特殊贡献也确是早有公论,康有为跻身近代教育家的行列也当是毫不逊色。但问题在于,康有为在近代教育进程中的作用该作如何的历史定位,这并不取决于他的学问多么渊博,教学多么精湛,而取决于他在近代教育改革潮流中的历史角色。由于影响着教育发展的社会因素错综复杂,教育家身处其中的价值取向也就不是靠着“进步”与“反动”的标签就可以简单判断的。历史研究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历史研究的魅力也在这里。

二

康有为在近代教育改革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当他站在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之上时,他在万木草堂的大海般的呐喊,他在维新变法浪潮

中的弄潮身姿,他寄托在《大同书》中的教育理想,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弟子们记住了他,是钟情于他的独树一帜的万木草堂讲学。而历史记住了他,却是他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顺应潮流拉车前进所表现出来的伟力。

历史不会忘记,当洋务教育步入维谷之时,是康有为振聋发聩的呐喊,深化了近代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从而迎来了近代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当是之时,传统教育机制有效地遏制住了洋务教育的发展势头,传统价值观念严重地阻碍着新式教育的进步。“恪守祖训”、“祖宗成法不可变更”的信条有如血盆大口,直欲吞噬刚刚萌芽的新式教育。虽然,洋务派人士及早期启蒙思想家们也还在不断地引进西方教育的成法以反思洋务教育的不足,但这些零星微弱的抗争远不足以震撼根基深厚的传统习惯势力。近代教育改革呼唤着一场更为狂飙的思想解放飓风。正是这时,是康有为顺应时代潮流而站了出来,他以《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两本巨著,在当时的知识界和教育界掀起了一场狂飙。

康有为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以更为深刻更为令人信服的理论来张扬救亡图存、富国强国的时代主题,为深化教育改革鸣锣开道。当年的洋务派只是从务虚者败、务实者胜这一直观的角度,为洋务学堂的开创而张目,而康有为则是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阐发了因革改制方可救亡图存的理论,从而为教育体制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当年的洋务派只是从事不如人则深为可耻这一直观的角度强调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而康有为则是从论证刘歆伪造经学着手,根本动摇了人们盲目信奉的祖训、祖法的基础,深刻地论证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当年的洋务派只是从直观的感性的层面来规划着修修补补性质的教育改革事业,而康有为则是从理论的高度论证了维新变法这一时代主题,给了国人思考教育改革以一个新的视野、新的角度、新的振奋、新的希望。这些理论的深化为彷徨于十字路口的近代教育改革洞开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天地。

康有为构造的理论之所以能在当时脱颖而出,独步一时,为近代教育改革洞开新的方向和新的天地,根本在于它的呼声反映了中国新生产资产阶级的要求。虽然从理论结构来看,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窠臼,但就其内涵来看,二者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洋务派所据守的“中体”是封建的专制制度和伦理纲常,而康有为所倡导的“中体”则是经他阐发的孔子改制

之说,经他改造的贯穿了经世致用精神的传统经典。洋务派所引进的西学局限在“西文”、“西艺”这些粗浅的范围内,而康有为所倡导的西学则增加了“西政”的内容。虽然后期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也接受了“西政”这一概念,但他的“西政”内容只包括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而坚决反对康有为在“西政”中关于议会政治和民权思想的内容。所以从总体而言,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是一个防御性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口号,其立足点是为了维护封建政体。而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则侧重于改制,侧重于加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力度。康有为正是通过这一理论特性,把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纳入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光照之下。

康有为理论眼光的新颖之处还表现为他对国民素质即所谓民智的关注。他从人的自然属性这一角度,强调了人的独立性和平等权利。他在《实理公法全书》中,从“人各合天地原质以为人”和“人各具一魂”的公理出发,肯定了“人有自主之权”。因而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维护人的自由权利,就是维护做人的资格。他的《大同书》就是以张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家族宗法制度的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尖锐地批判。他明白地宣示,在宇宙间,人是最可宝贵的,人是天地之精英。他认为,世间评判是非善恶应以人为标准。“凡有害于人者为非,无害于人者则为是”,人类奋斗和进步应以恢复“人为万物之灵”的价值,恢复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为终极目的。他说:“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他在书中设计的一套完美的教育制度,就是要在理想社会中创造一个同为世界之人、同育公家、同学公学、万千并头、喁喁向上的教育环境,为人生追求极乐境界奠定基础。虽然康有为在这里所宣传的“人”还局限在自然人的范畴,所宣传的人道主义也只是一种抽象的幻想,但这些主张却突破了封建主义抽象的、附庸的、家族意义上的人的传统框架,将近代教育改革目标的思考从洋务教育对技艺的关注引向了对人的智力素质的关注。这一理论视野为深化近代教育改革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

康有为的历史功绩不仅体现在从理论上为近代教育改革摇旗呐喊,而且体现在从实践上为近代教育改革的深入推波助澜。洋务教育虽然在教学内容的层面上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框架,然受制于传统教育体制的束缚而不能有大的作为。当时反思洋务教育的呼声虽然此伏彼起,但大都不得要领而难成气

候。康有为顺应潮流,把握机遇,敏锐地抓住教育体制改革这一关键,鲜明地树起了“变科举”、“兴学校”这两面旗帜,确定了近代教育改革的新突破口。康有为的智慧和胆魄在这一斗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变科举,以废八股为目标,借此将传统教育体制狠狠地敲打了一番。其兴学校,以构建新学校为目标,意图从学校体制上确立新式教育的地位。这一破一立,开创了近代教育改革的新局面,将近代教育改革从教学内容的层面引向了制度改革的层面。中国教育改革的近代化方向至此已日趋明朗,近代新学制的建立也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康有为的名字也就因着这些业绩而彪炳史册。人们只要谈起近代的教育改革,谈起近代思想解放,就不可能越过康有为,康有为的历史地位也就因此而铸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康有为的历史功绩与孔子具有同等意义。两人都是处于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转折关头,也都同是顺应了教育发展的时代需求而奋力呼号,并都为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从这点看,康有为晚年在寿联上以孔子自诩,以历尽磨难志有所成而得意,这确实是他人生的大慰藉。

当然,康有为在寿联上所表现的愤世之情则是不客观的。他晚年爱模仿着孔子的口吻,在外人面前谈天说命,哀叹世事不公,大有一副上帝之子落难人间的架式。他将晚年的不得志归咎于天,哀叹“天乎人间是何世,命也我生逢不辰”,似乎世人皆醉惟其独醒,世道浑浊而其回天无力。其实,康有为至死也没有明白,随着教育近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是他自己从这一潮流的浪尖上跌落了下来,是他自己渐渐地游离于这一潮流之外,由隔膜而渐趋对立。在同一个人身上,在同一股潮流的卷裹之下,时间的间隔并不长远,康有为的前后表现却判若二人,这实在令人扼腕。

扼腕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康有为何以会在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落伍?

三

中国教育近代化要实现的是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完全转化。它要与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步向与近代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新式教育演变转化。这是一场深刻的全面的教育变革。它不仅表现在教学内容、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和手段等物化层面的彻底变革,而且还表现在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价值取向等观念层面上的

深刻变革。加之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又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进行的,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萌发与深化的,这就更增添了这场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些特性也就决定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一个在资产阶级革命光照之下,以近代世界先进教育水平为标杆来构建中国新教育精神的历史过程。

康有为纵身一跃投身而入的就是这么一股时代潮流。那么,康有为的思想准备和素质准备是否具备了横渡教育近代化彼岸的水准?

康有为渴望在中国加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力度,但他对资本主义教育并没有作过深入研究,对资本主义教育并没有透彻的认识。康有为向往西学,热盼科学,但他的西学功底并不深厚,并不扎实。他只是从当时的启蒙小册子中零星地接触了一些西学知识,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近代自然科学,更没有认真地阅读过西方资产阶级经典著作,因而康有为对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精神的领悟只是停留于表层的印象而缺乏本质的把握。这样的知识结构便极大地局限了康有为的教育改革理想。

康有为痛恨传统教育的腐朽,痛恨传统伦理纲常对人的摧残,痛恨八股取士的空疏无用,但康有为的感情深处却存留着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朝廷的深深眷恋,这便大大减弱了他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力度。以致发展到晚年,康有为甚至沦落到美化封建教育,美化君臣伦常的地步。这种潜藏于深层意识中的情感导致康有为虽然承认了资本主义教育体制的先进,渴望中国也能出现学校林立、教育普及的景观,但他又极力将这一新制度寄托之于三代先王以行之。这种以古为尚的传统思维模式使康有为认定近代的教育改革并非是根本变革旧制,而是以古时之良法,参以西法,来改善现存的教育制度。这样的思想决定了康有为在近代教育改革进程中不可能走得太远。

当然,康有为不大愿意承认这些,他总说自己是个遨游星空、洞悉宇宙的先知先觉者。但梁启超却很直率地指出了他们生活于西学传入尚不深广的“学问饥荒”之时,因而只能“冥思枯索,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他们的“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陋,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6](P91-92)。这一事实典型地说明了康有为乃至维新派的素质水平带有极大的时代局限。

而且,儒家学说中过分看重和夸大主观作用的

偏颇对康有为影响至深。康有为热盼教育改革早日成功,中国早日富强,但他对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在规划每一件改革事项时,总是依据自己的主观想象而妄下定论,总爱发出三年可成、五年大见成效之类的许愿,把复杂的社会改革事业看成是如同揉捏面团那般的轻易。

康有为的这些素质缺陷最终导致了他在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落伍。当他忧虑国运危蹙,渴望加速资本主义进程,立志拯救人民于水火时,他的愿望正好顺应了教育改革的时代潮流。这时的康有为搏击风浪得心应手,风流倜傥。当教育近代化潮流奔腾得更为迅猛更为高涨,这位弄潮儿便觉得这风浪太险,这历程太远,甚至觉得这潮流欢歌奔向的彼岸根本就不是他所想象的彼岸。于是,他上岸了。眼睁睁地看着时代潮流东去,他只能发出几声诅咒,几声哀鸣。

康有为的悲剧是时代性的。近代中国是个新旧交替变革剧烈的时代。生活于这一时代的人无一不受到新旧竞争、中西碰撞的影响,康有为的素质缺陷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进程的萌发,并不是产生于社会本身经济结构的变化需要,而是由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而促成的。开启这一进程的洋务派并不是新生阶级的代表,而是旧阶级旧制度的维护者,其眼光其目标其手段其措施都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进程不可能一步到位。靠了洋务运动的开展才得以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与封建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和难以割舍的感情。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进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中国近代所涌现的每一政治派别的眼光和素质又决定了近代社会改革的阶段性。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在一代人手中完全实现,它只能由数代人如同接力赛那样,不断地将教育近代化的火炬一步步地送往终点。每一时代的先进人物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素质缺陷,都不可避免地烙上那个时代的印记。换句话说,中国教育近代化是一场全方位的深刻的教育革命,然而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并不具备造就能够自始至终推进这一进程的杰出人物的条件。康有为的悲剧就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问题是,素质缺陷是可以弥补的。一个人只要能真诚地追随时代潮流,不断地更新和调整自我追求,就能跟上时代步伐永不落伍。康有为恰恰是在这一问题上的为自己的悲剧结局埋下了隐患。

康有为很早就萌发了以经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面对民族苦难国家危亡,他立志拯救国家人民于水火,年轻时就喊出了“布衣何处不王侯”的强音。康有为忧国忧民,立志于此确属难能可贵。但是,康有为过高地估计了个人的作用,对自己缺乏客观的评价和清醒的认识。他学习每有创获,便“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慨”;他思虑救国途径,常常“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4](P5)}。他认为天下皆醉惟我独醒,惟有靠他才能唤醒人们的“后知后觉”,惟有靠他才能为受苦受难的大众指引人生极乐之路。维新运动时期他顺应潮流的振臂一呼,更使他为自己的“先知先觉”而感动,他渴望君临天下的欲望也因之膨胀。只是由于封建正统思想的作祟,他把个人追求定位在“教主”这样一个角色,以期望依附朝廷借助皇权而号令天下。

这一定位与他的自信乃至固执性格相结合,导致康有为的思维定势开始趋于封闭和保守,导致康有为的自我中心的欲望极度膨胀。为了神化自己,他有意将自己封闭起来,公然鼓吹“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6](P86)}。其实,“不复有进”是假,康有为的思想成熟正是在30岁以后。而且随着维新运动的开展以及流亡国外,甚至在他的晚年,康有为的思想和主张都处于变动之中,都在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修正着自己的观点。但他内心的“不必求进”则从主观上断然杜绝了追随时代潮流不断更新不断调整的一切可能性。他决然地拒绝一切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辛亥革命后顽固地坚持尊孔读经,公然地参与复辟活动,都是思想上固步自封的直接后果。

为了神化自己,他祭起了孔教的旗帜。如果说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的尊孔对历史的进步还具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辛亥革命后康有为的尊孔则全然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不是客观地历史地分析评价孔子的学说,不是批判地辩证地认识孔子学说的价值,而是通过吹捧和美化封建社会来神化孔教。他仿效着汉代的董仲舒,企望借助近代科学来神化孔教而构建他的宗教理论,甚至不惜掺杂进大量封建迷信的货色来阉割科学。科学在他的手中成了宗教的婢女,孔教也只是披在他身上用以吓人用以抬高身价的一张虎皮。康有为一生的两次尊孔,正好显露了他从早年追求人格的重塑滑落到后期人格的失落这一思想轨迹。

为了神化自己,他处处以人神自居,在门徒同党中大搞个人崇拜。他听不得不同意见,更不允许有

人违逆他的意志。他一方面要求别人极严,在同党及家人中大行家长作风,另一方面对自己则纵欲奢侈,挥霍无度。这种理论一套、实践一套的作风,与早年康有为的作风相比,其变化是显而易见。早年的康有为忧国忧民并付诸行动,其人格是统一的。然后期的康有为则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统一的人格实质已分裂为二。对后期康有为走向人格分裂的状况,连他的学生在给他作传时也绝不肯讳言:

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而日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极好西学西器,而礼俗、器物、语言、仪文,皆坚守中国;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事中国。凡此皆若甚相反者。^{[4](P95)}

凡此种种,不难看出,康有为的思想演变已是日趋封闭保守。他所忧虑的只是其教主的地位能否实现,所追求的只是其教主的淫威能否享受。这一思想的倒退便与奔腾向前的时代潮流南辕北辙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康有为立志做一个教主,其意并不在教育,而是在政治。纵观康有为一生的追求,其对社会演变的兴奋点始终在政治方面。康有为办学讲学,其真实目的是在纠集政治力量,其倡导教育改革也只是因为这是其推行政治改革目标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后其对教育界废除尊孔读经的不满,也

是为政治而不是为教育。这也是导致康有为在教育近代化进程中落伍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促使教育的发展逐步摆脱“政教合一”的模式,向教育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方向过渡。“政教合一”是传统教育的重要特征,这是人类教育不发达的反映。在这一模式下,教育的发展受到政治的高度控制,成为政治的工具和附庸,教育的进步也就必然要借助政治的变革才能实现。近代教育改革的发端就是如此。可以说,没有近代政治改革的开路,肯定就没有近代教育的改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康有为从政治改革着手来推动教育改革的深入,这是他在维新运动时期对近代教育改革卓有建树的根本原因。但是,随着近代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政教合一”的模式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现代教育的发展越来越要求遵循自身的规律。而康有为的思维定势依然停留于“政教合一”的老套,依然习惯于从政治角度来评价近代教育的发展,依然根据自己的政治热情来调节关注教育的兴趣,以致他对辛亥革命后的教育越来越反感乃至失去兴趣。这是导致康有为日趋游离于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之外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应该是我们为康有为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功过进行正确定位的主要途径。

参考文献:

- [1] 汤志钧. 康有为政论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2] 姜义华, 张荣华. 康有为全集(第十二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3]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社, 1983.

- [4] 夏晓虹. 追忆康有为[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 [5] 陈汉才校注. 长兴学记[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 [6] 梁启超.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8.

On Kang Youwei as an educator

WANG Jian-j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Kang Youwei's historical stature in promoting the Chinese education reforms. This historical study is to give a fair account of Kang You-wei as an educator in relation to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factors.

Key words: Kang Youwei; educator; success and failure

[责任编辑 高小立]